

第二编 秦汉史学

第一章 秦的史学

- 一、别为一系统的文化……………(117)
- 二、史官与史书……………(118)

第二章 汉初的史书

- 一、《楚汉春秋》……………(121)
- 二、其它史书……………(123)

第三章 司马迁《史记》

- 一、详细占有丰富的资料……………(125)
 - 1. 书籍 2. 交游 3. 访问 4. 金石
- 二、创造性的体例……………(129)
 - 1. 本纪 2. 十表 3. 八书 4. 世家 5. 列传
- 三、给后代起的作用……………(153)
 - 1. 建立通史体裁 2. 建立史学独立地位
 - 3. 在文学上所起的作用

第四章 班固《汉书》

- 一、班固撰修《汉书》的态度和体例……………(158)
 - 1. 撰修态度 2. 撰修体例
- 二、班固和司马迁的分歧……………(175)

第七章 肖子显《南齐书》

- 一、《南齐书》的撰修……………(259)
- 二、不信鬼神而阐发天道禅理……………(261)
 - 1. 阐发天道
 - 2. 阐扬禅理
- 三、类叙法和自叙……………(264)

第八章 魏收的《魏书》

- 一、魏修国史与崔浩灭族的原因……………(266)
- 二、魏收的撰修《魏书》……………(269)
- 三、《魏书》的评价……………(271)

第九章 历史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

- 一、历史地理的名著……………(275)
- 二、《水经注》研注的成果……………(277)

第十章 反佛、纪实的《洛阳伽蓝记》

- 一、弥足珍贵的名著……………(281)
- 二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版本……………(284)

《易·系辞下》说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夬（决也）。”这里所谓的“圣人”，便是指统治阶级中那些创造文字以之记载历史的人。有了记载文字的历史，从中鉴往知今，“决断万事”，就可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文武群僚，督察被统治阶级里的广大人民。有名的思想家王充说得好：“先结绳，易化之故；后书契，难治之验也。”（《论衡·齐世》）

所以班固总结上段《系辞》文字的意义和目的，说是“其用最大”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章学诚既说：“文字之用，为治为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下》）又说：“文字之道，百官以之治，万民以之察，而其用已备矣。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，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”者。（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）是统治阶级制造文字，记载历史以给他们的统治服务，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
然则我国最初创造文字，是在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呢？据孔安国《尚书·序》，便是太古时代的伏羲氏。据《世本·作篇》，便是黄帝时代的沮诵、仓颉。但伏羲、黄帝，都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，那时既没出现阶级，又那有产生文字的现实条件？何况文字的产生，必须是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积累的结果，决不是某时、某人、某两个人从头脑中突然间能够制造出来的。所以这些记载，只能说是以神格为中心的古代神话而已。

只有在那畜牧业已很发达，而农业且成了主要生产部门，奴隶制占主要地位的商代，才给我们留下了后期武丁至帝辛（纣）的甲骨文字。这种文字，基本上诚然是在象形时期，但写法却已出现多种姿态①；甚至还有少数的假借字、

3、小史掌理诸侯国内所有记录的志书，外史掌理四方的志书。以后国别史的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以及地方志，也都是从这里逐渐发芽、滋长起来的。

4、小史的职务，在奠定诸侯王国的世系，辨定左昭右穆的亲疏。从而司马迁列帝王为本纪，诸侯为世家，而后代的谱牒之学，可以说都是从这里起源的。

从上可知中国史官设置很早，职位很高，史官即是史家，他们所著史书且给后代史书体裁起了播种、萌芽的作用。

三、先秦史家的优点

我国古代，对人类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，史学便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。这个史学上的极大成绩，当然是由先秦的史家开创的。

先秦史官，有名当时，传声后代的，夏有终古，商有高势，周有史佚、周任、史籀等。周自东迁，政权下降，诸侯没有史官而由王朝外史掌四方的制度^①，也都荡然不存。因之，除王朝有内史过、叔兴、叔服、守藏史老聃外，诸侯各国也都设有史官。诸如：鲁左丘明，虢史黯，晋史苏、董狐、史墨，卫华龙滑、礼孔，齐南史氏，楚倚相等。战国虽是尚游说，讲纵横的时代，秦、赵会于澠池，莫不都有参加的御史。甚至大臣如晋赵鞅，齐田文，也都有司过的侍史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。象中国这么一个大国，只记中央政治的变迁，中央政府的人物，中央制度的沿革，不把历史的中心分散；就不可能有墨子见到的百

国春秋，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孔子的《春秋》，左丘明的《左传》②。

中国史官职责，原是历记古今成败祸福存亡之道，辅佐统治者统治天下的。他们都是博闻强识，疏通知远，而又中正不屈，直书其事以为惩劝之士。北宋文史名家曾巩就曾

说：古代史官，必须是“天下之材，”而“皆圣人之徒。”（《南齐史·序》）清代史学权威章学诚又认为曾的这种说法是卓越的。（《文史通义·史德》）这就足见先秦史官，确是极精华之选，品质高尚，学问该通，识见明达——有才、有学、有识、有德，值得我们后人称述的。

1、秉笔直书

“史者，国家之法典也。自君臣善恶、功过，与百事之废置，可以垂戒后世者，皆得直书而不隐。”（《欧阳永叔文集·论史官日历表》）可见史官实是最高统治阶级的“谔谔之臣。”（刘向《说苑》）不但皇帝一动，左史书之；一言，右史书之。（《礼记·玉藻》）太子满了二十岁成人之后，也有司过的史官。（《大戴礼·保傅》）赵鞅，晋的大夫；田文，齐的公子；也都有司过的史官。（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）这因“史之为务，申以劝戒，树之风声”，（《申鉴·时事》）而使做皇帝、太子、大臣的不得不有所戒惧而放肆地去胡说非为。做史官的呢，也就更得“据法守职，不敢为非”，（《韩诗外传》卷5）“中正”无私，书法无隐，决不为威武、权势所屈服者。比如：

周成王剪桐封弟，自己以为是戏言，史佚却以为“天子无戏言，”致使成王不得不封其弟叔虞于唐；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不得不接受教训，重视“言以出信”，“言以出

起来，便著书立说，以期拨乱反正。但却“不敢修周史，而修鲁史。”（《蛾述编·春秋托始于隐公》）修鲁史，又不敢言制作，而只“述修先王之道”而已。③

正因为老聃、孔子，不肯轻于著书；即是著书，也只是述旧而已。“一曝而四益”，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了不朽之作，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时文。

5、有疑则阙

古人著书立说，是非常慎重的。包注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说：“古之良史，于书有疑则阙之，以待知者”，决不无根无据，凭主观去妄事穿凿附会。何况“书必同文，不知则阙，问诸故老”，原是不容忽视的“古制”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孔子所谓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荀子所谓“言之信者，在乎区盖之间。④疑则不言，未问则不立。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也都正是这个意思。如其“不知而不问人，用己私，是非无定，巧说邪辞，使天下学者疑”（《说文解字叙》）矣。清代名学者孙星衍就曾说：“古人重考据，甚于重著作，又不分为二。”（《问字堂集·答袁简斋书》）正见古人著书是以崇学务本为务，而一字也不肯轻于放过的。

至于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举凡连属原始材料中的辞语，排比原始材料中的事实，莫不逐字、逐句、逐事，加以慎重地研究。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；剔其粗伪，取其真精。所谓“属辞比事”，正是孔子作《春秋》所举出来以为世人修史的好方法。（《礼记·经解》）尽管他长于文学的高材生子游、子夏，也都不能旁赞一辞。

所可惜的，只是当时已在周末“衰世，是非无正，人用

其私”，既有“各任其私意而为字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，又“有穿凿妄作篇籍者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包注）甚至有“诡更正文，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，变乱常行，以耀于世”（《说文解字叙》）者。也就使得孔子再也不见有疑存缺的人了！

6、言为世则

曾巩作《南齐书序》说：“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”这就是说，先秦称职的史官，必须兼备学、德、识、才四个长处。而他们的职责，又是“历记成败、存亡、祸福，古今之道，然后秉要执本，……（以成）人君南面之术，可以为治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理天下的格言的。

试看：周任，商的太史。史佚，周初的太史。他们都成了“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；其身既没，其言尚存”（《左传》襄25）而成了后人引来用以说服人家的典则。比如：

韩之战，秦人俘虏了晋惠公。公子絳想把他杀掉，子桑却主张送他回去。意见分歧，难于决断。子桑便引史佚“无始祸，无怙乱，重怒难犯，陵人不祥”的话说服了子絳，而把惠公送回了晋国。（《左传》僖15）

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于鲁，襄仲怨恨他娶去了自己的爱人，虽然亲属兄弟，也不想哭他的丧。惠伯乃引史佚兄弟各尽其美的话，劝他“不要绝其相亲之道”。他就率领兄弟们哭丧了。（《左传》文15）

晋侯问荀偃，卫逐其君，当要讨伐吗？偃因卫已立新君，便引史佚不如因而抚之的话，而抚存卫了。（《左传》

秋谷梁集解》) 拨乱世反之正。胡安国又说：“周道衰微，王纲解纽，乱臣贼子接迹，当时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是故仲尼假鲁史以寓王法，拨乱世反之正，其志存乎经也。”（《春秋传·自序》）总之，当时乱臣贼子肆欲横行，而周天子对他们又不能治罪⑤，于是孔子作《春秋》来把他们当作口诛笔伐的对象了。

又当时各国虽然都有史官，而且所修之史也都叫春秋⑥。但因“当时列国僭乱，名分混淆，而史体乖舛”，（《史记会注考证·孔子世家》）给乱臣贼子大为回护⑦，“故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。”（《史记·儒林传序》）他之所以修《春秋》，是“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，是恶大夫之逼而存诸侯。”（宋·黄仲炎《春秋通说》）这就是说，春秋初年诸侯强，所以要抑制诸侯；春秋末年大夫强，因而要抑制大夫。总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是想兴复王教六艺之文的典籍，正名分而使乱臣贼子不得不有所畏惧的缘故。否则，“异端之书或秕糠尧、舜，残毁仁义”，（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·为政》）那就大盗横行，大乱不止了！可见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是以儒宗的身分，阐发他的“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的政治哲学，极力“攻其异端，使吾道明，则其异端之害自止”，（孙奭《示儿篇》）而有他极其强烈的政治作用的。

再则，“王者之政，莫大于巡狩述职。巡狩则天子采风，述职则诸侯贡俗，太师陈之，以考其得失，而庆让行焉。洎乎东迁，而天子不省方，诸侯不入觐，庆让不行，而陈诗之典废。孔子伤之，不得已而托《春秋》以彰褒贬，所以存王迹于笔削之文。”这就是“孟子历叙群圣之事，而以孔子作

也就使它不能留存而成了逸书。（王鸣盛《尚书后案》、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）原来的《武成》，既使之遗失而不留存，于是又伪造“晚出《武成》，则言前徒倒戈攻于后”。从此，“血流漂杵”，是“纣师自杀之之血”（《孟子正义·尽心下》）也。可见儒家为了要美化武王，也就千方百计地把他说成是个力行“王道”的圣王，所率领伐纣的是一支不杀的仁义之师。我们如其相信此等古书，则就真不如无此等古书了。从而使我们知道，许多儒家正宗派写的历史典籍，并不是客观的正确反映，而是他们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伪造出来的。

总之，因为《逸周书》的《克殷》、《世俘》如实记载了武王灭纣的残暴，揭穿了儒家美化武王之行仁义的秘密，使“儒家不甚爱惜，任其脱烂，或又从而黜排之”，（《逸周书校训集释周书逸文》）以致内容残缺，篇次错乱，虽经历代学者注释校正②，但至今还是使人不易彻底了解它的意义的。推求渊源，则孔子之摒弃《逸周书》实是始作俑者呀！

注：

①、左丘明传《春秋》曾多次引《周书》。如：“勇则害上，不登于明堂”。（文2）又如：“慎始而敬终，终乃不困。”（襄25）又如：“居安思危”。（襄11）

②、研究《逸周书》的书，今有晋孔晁的注本，但已不全。此外，有王应麟《逸周书补注》、朱右曾《逸周书校训集释》、孙诒让《周书斠补》、何秋涛《王会篇笺释》、刘师培《周书补证》、陈汉章《周书后案》。

第三章 左丘明的史学

左丘明，鲁国的太史（太史的职责，已见第一章）。他不巧言好说以口舌胜人，不和颜悦色以面孔媚人，不卑身屈己有求于人（《论语正义·公冶长》）。他是一位品质高尚，性情耿直的正人君子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）；决不是一个“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”（《方望溪先生全集·万季野墓表》）的史家。

鲁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所建立的国家，文化发达，文物完备。左丘明不但熟悉鲁的文献掌故，而且博通当时各国的历史。诸“如：《桡杙》纪年之流，《郑书》、《晋志》之类。凡此诸籍，莫不毕覩。”（《史通·申左》）撰修史书，必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。他既有如此渊博的历史知识，品质又复那么高尚，也就构成了写好、编好史书的必备条件。

刘知几说：“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并生，论才则同耻。”（《史通·鉴识》）也就是说他俩的思想观点，正是相同的。所以孔“夫子引为同调，倾服已极。”

（周寿昌《汉书注校补·古今人表》）将作《春秋》，为了广事收集原始资料，便同他共去东周参阅王朝所藏的图书；回鲁以后，又一同参考了鲁政府所藏的典籍；孔子修成了《春秋》，又“膺授经之托”。于是一面同孔子磋商，一面来自四方的孔子弟子采访（《史通·申左》），而将孔子所作《春秋》的简纲目，原原本本，曲曲折折，加以精密细致的叙述。其文渊懿美茂，其事谨严分明，将春秋时代的

能手，就是因为从“民本主义”出发的。战争是要人民去打的，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民而不是其它，这在左丘明都曾通过许多战例给以了充分的记述。

鲁庄公对人民的诉讼，能够尽情酌理的处决，也就得到了人民支持，在长勺战争中打败了强大的齐国（庄8）。狄人伐卫，因为卫懿公好鹤，平日所优待的是鹤，临战人民也就不愿从军以致遭到了覆灭（闵2）。齐桓公想称霸诸侯，兴兵以讨不义之国。管仲就要他首先把内政办好——不夺农时，敦厚风俗，然后才能称兵如意（《齐语》）。晋文公要发动人民打战，首先就教导人民知道礼，知道信；又能选拔“不忘百姓”的郤犨做元帅，也就在城濮打败了劲敌楚国（《晋语四》）。邲之战，楚国因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典则，因而平时农、工、商、贾各安其业，战时兵士和睦，也就打败了强敌晋国（宣12）。鄢陵之战还是开始的时候，申叔时就已指出德、刑、祥、义、礼、信是战争所以取胜的武器。有了这种武器，则上下和睦，一心一德，不怕牺牲，去争取胜利。今楚王不顾人民的死活，徒快自己的意志，有谁给他拼命呢？非失败不可。结果也就真地被晋打败了（成16）。同是一个吴王夫差，先因爱惜人民而得民心，也就战胜了楚国。后因劳役人民以求一己的私欲（《楚语下》）；而越王勾践却又爱惜人民（《吴语》）；人民怨恶的，去之；不足的，补之。人民也就拥护他，替他卖命，打败了夫差，消灭了吴国（《越语下》）。两两比较，不就更加证实了战争的胜负是由民心的向背所决定的吗？

注：

①、孔子认为“孝”是德的根本（《孝经·开宗

明义》。以下引《孝经》只注篇名)。所以他说“圣人之德无大于‘孝’。”(《圣治》)孔子认为“孝”是仁的根本(《论语·学而》)。所以他说“人之行莫大于‘孝’。”(《圣治》)从而他以“孝”治天下的结论是：“昔者，明王之以‘孝’治天下也。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先王，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。是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故明王之以‘孝’治天下也，如此。”

(《孝治》)这也就是他的高足弟子有若说的以“孝”治天下，将使天下之人恭顺“而好犯上者鲜矣！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”(《学而》)的原因。这就可见孔子之著《孝经》决不是托之空言，而是以“孝”治人，“以明君臣、父子之所寄”(邢昺《孝经注疏序》)，使天下之人始而以“孝”事亲，中而以“孝”事君，终而以“孝”立身(《开宗明义》)。这和他作《春秋》以道名分，而使天下之人安分守己，是相互为用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。

②、孔子针对当时“鲁秉周礼之国而僭郊禘，管仲贤大夫而备三归”之践踏“礼”的现实，提出了以“礼”治国的“‘礼’者，理也；”(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)“礼者，即事之治也”(《孔子家语·论礼》)的论点。他说：“为政先礼。礼者，政之本。”(《大戴礼记·哀公问》)能够以“礼”治国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(《论语·里仁》)如其治国而无“礼”，那就象瞎子走路无人牵扶，将往那儿走去呢？(《仲尼燕居》)因之他又说“上好‘礼’则民易使也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，人不学“礼”是站不起来的。从而他教导学生一切听、视、

而在文体上则更有大大的解放的。

所以挚虞说：“左丘明本为《春秋》作传，而《左传》遂自孤行。”（《晋书·杜预传》）又王“接常谓‘左氏辞义贍富，自是一家书，不主为经发’。”（《晋书·王接传》）是《左传》虽是为传《春秋》而作的，却又是一部具有独立性的史书。

第一，《春秋》的记载以鲁本国做中心。而《左传》虽以鲁为“我”，但叙述最多的是晋，其次是楚，再次的才是鲁；而于齐、郑、卫、宋、秦，也多有记载。

第二，《春秋》所涉及的，只是各国政治范围内的事情；《左传》却不限在这个圈子里，而是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全貌。且于典章文物，记述很是详细。这就将历史范围，历史意义大大地向前扩展了。

第三，《春秋》所记载的，只限于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；《左传》则常常通过当时人物的对话，向上追溯到许多旧史遗闻。又《春秋》只写至鲁哀公十四年，而《左传》则记述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才告辍笔。从而《左传》也就成为后代人不但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著作，而且是研究春秋以前史事的重要史书。

第四，刘知几说：“传之与经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”（《申左》）但究有有经无传的，如伯姬归于纪，夫人子氏薨是。有有传无经的，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、桓、昭、哀四君是。甚至有在同一事件里，二者的观点，也有不同的。如《春秋》书“赵盾弑其君”以深责执政的大臣，《左传》则说“晋灵公不君”以深究为君的罪恶，所以说“丘明自用其意说经。”（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

证》)所以刘知几说“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”(《史通·载言》)，而有他自己的创造意义，独立精神。只是经过后人的改编，把《左传》附在《春秋》的后面而称《春秋左传》罢了。正因“左氏之为传也，虽义释本经，而语杂他事，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。故二传(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)大行，擅名于世。”(《史通·疑古》)而《左传》则被排斥，不得立于学官。

第五，章学诚认为古代史书“未尝分事、言为二物”，“而以《尚书》分属记言，《春秋》分属纪事，则失之甚也。”(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上》)然而真正记事而又记言，记言而委婉生动，记事而简明雅洁，二者艺术都达到高度的成就的，则首推《左传》。刘知几就曾说：“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。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”(《载言》)正因为《左传》写的新颖生动，文采丰富，也就给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的写法开辟了一条新生的道路。

总之，左丘明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历史作家，是孔子学术上、道谊上的一位知己。他传《春秋》，诚然是受了孔子的委托；又复“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”，而征求了他们的意见，以《春秋》做大纲，以孔子的历史哲学做理论基础，而“著将来之法”。但却除了和孔子参考的许多资料以外，又复自行广泛地搜集种种野史遗文，经过严密细致地结合自己的观点，编而次之的加工，所述范围无论在空间、时间以及内容方面，都较《春秋》有所推广；又复严肃认真地加以“琢磨润色”，因之文笔也又显得生动雅洁，“独成一手”(《申丘》)，独具一格。这正是左丘明在史学上的独特成

就，也是史书在编著上的一个大发展。所以在中国史学史上真正当得起比较完备、美善的历史著作，就得首推《左传》为最早的一部。总之，左丘明传《春秋》，不但“是非不谬于圣人”，（刘向赞左氏语）而且有他的“创作性，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。”（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·文化专史及其做法》）

三、左丘明史学对后代

史书所起的作用

左丘明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最杰出的史学家，无论是他所著的《左传》，还是编纂的《国语》，都对后代史书的体例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1. 《左传》对后代史书体例所起的作用

左丘明传《春秋》，是怎样保持原书中的意义的呢？那就是基本上遵守孔子的意旨，以《周礼》为本，凡是发凡起例都一本周公的旧制。那么，《春秋》的义例，又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依据各国的国史，有一定书法的，是为“正例”。第二，《春秋》自有新义，则举史事以说明的，是为“变例”。第三，只是补叙史事，意义属于次要性的，则叫做“归趣”。

所以刘知几说：“《春秋》之作，始自姬旦（周公），成于仲尼，所有笔削及发凡起例，皆得周典，传孔子教，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。”（《申左》）又说：“孔子既著

不断如丝。至汉兴划挾书之令，则儒者肆然讲授，经典寔兴。左氏与孔子同时，以鲁史附《春秋》作《传》，而公羊高、谷梁赤，皆出于夏门人。三家言经，各有回舛，然犹悉本之圣人，不敢辄改也！啖助在唐名治《春秋》，摭汕三家，不本所承，自用名家，凭私臆诀，徒令后生穿凿诡辩，诟前人，捨成说，而自为纷纷，助所阶已”！（《新唐书·啖助传赞》）宋祁这段话确实是击中了啖助弊病的要害。从此谈经风气大变，凭私臆，逞诡辩，妄骂前贤，啖助实是一个始作俑者的大罪魁。清代的经史名学者王鸣盛就曾对宋祁这段话大加赞赏说：“此段论断则甚确切，中若辈病痛”（《十七史商榷·新啖助传误》）。又说：“《新唐书传赞》出宋祁，乃有此言，不特切中唐人说《春秋》之弊，凡宋、元、明人解经病痛，皆可以此为良药”。（《蛾术编·废传说经》）王氏一再赞扬宋祁的话打中了啖助说经的弊害，但言之者虽是淳淳，而附和啖助的听之者却是藐藐呢！

2. 驳斥陆质谈经的妄说

啖助既以为左丘明只是口传《春秋》之义，而著之竹帛的则是后代的学者。于是他的高足弟子陆质便助之张目，极力鼓吹老师的论调；并以老师所说为不足，而变本加厉地胡说什么“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。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、谷，诬谬实繁。若丘明才实过人，岂宜若此？推类而言，皆孔门后之门人。但公、谷守经，左氏通史，故其体异耳。且夫子自比，皆引前人。故曰‘窃比于我老、彭’。又说伯夷等六人云‘我则异于是’，并非同时人也。丘明者盖孔子以前贤人。《论语》云‘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’，如史佚、迟任之流，见称于当时耳。焚书之后，莫得详知，学者

各信胸臆，见《传》及《国语》俱题左氏，遂引丘明为其人，此事无明文”。（《春秋啖赵集传纂例》卷一）“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解《春秋》，子弟门人，见事迹多不入《传》，或复不同，故各随国编之，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？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·春秋类》）

其实，陆氏以上所说，都是他自己只“信胸臆”，“事无明文”的说法。第一，他既以左丘明为孔门的后人，又以左丘明为孔子的前人，就充分说明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是非不定，难于决择的。其实，《御览》二百八引《符子》曾明言，“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，将召三桓而议之，乃谓左丘明曰：‘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，而授以鲁政焉，寡人将欲询诸三子。’左丘明曰：‘孔丘其圣人与！夫圣人任政，过者离位焉，君虽欲谋，其将弗合乎？’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，而召孔丘为司徒。”是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之人是事有明文，不是“事无明文”，又怎能说左是孔门的前人或后人呢？第二，左丘明姓左丘，名明，并不是姓左名丘明。（详后）第三，王弼就曾说“老是老聃”。（宋、邢昺疏引）那么，这“老”不就是与孔子同时而孔子且向他问过礼的老子吗？为何还要自凭胸臆，把他说成是孔子引以自比的前人呢？第四、孔子就曾说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”。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由此可见，孔子不但以当时人自比，而且以当时广大的十室之邑所有的人都自比了。又怎么能说“夫子自比皆引前人”呢？古话说得好，“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，而难以正己之是。必有得也，乃可知其失；必有是也，乃可斥其非”。今陆质却徒好攻人之失，言人之非；而自己却无一是一、一得，也就不能正己之得，而只